

# 罗振玉书法藏品在日本的出版

—以《书苑》杂志为中心

张 亚 敬

Luo Zhenyu's Calligraphy Collection Published in Japan:  
Focusing on Shoen Magazine

ZHANG Yajing

## Abstract

After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Luo Zhenyu's family moved to Japan, and lived in Kyoto for more than seven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Luo Zhenyu devoted himself to academics and writing books, and also participated in cultural activities in Japanese academia. He raised funds through the sale of collections, preparation of exhibition activities, or by engaging in publishing. Luo Zhenyu made public the cultural relics that he brought to Japa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Shoen Magazine, published by Hoshokai, as primary source material, and on Luo Zhenyu's collections, examining the pub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his calligraphy collections in Japan during the Meiji and Taisho eras (1868-1926), and investigating the cultural trends in the publication of calligraphy materials during this period. On the one hand, members of the Hoshokai, represented by Kuroki Yasuo, facilitated Luo Zhenyu's networking in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Shoen Magazine was a vehicle for the efforts of these Sino-Japanese scholars in calligraphy.

**Keywords:** 罗振玉、《书苑》、出版、书法

## 一、引言

罗振玉(1866-1940),出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上虞。字式如、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号贞松老人。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收藏家及书法家,其一生涉猎广泛,著述良多,在他74年的生涯中,共著书189种,校刊书籍642种,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者之一。郭沫若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谈到:“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sup>1)</sup>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新材料相继出土之际,罗振玉便是较早投身于甲骨、敦煌文书、西北简牍、古器物等资料收集中的学者。虽身处变革之乱世,却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除了与同好互赠资料、交流治学以外,罗振玉还积极投身于文化资料的影印出版,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地集古、考古、证古、传古,也劝言身边的人。如刘鹗在罗振玉的鼓动下公开了《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在时报刊登的有关《铁云藏陶》、《铁云藏龟》的广告中,呼吁同道中人拿出己藏公示于世,从而推进古文字学的研究,正如他们所刊登的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近来新学日明、旧学将坠、愿与两三同志抱残守缺、以待将来。”罗振玉重视研究材料的收集、考证和出版,既在学术研究上为我们提供了方式方法的示范,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基础材料,本文主要聚焦于辛亥革命后罗振玉在日本寓居期间,通过日本的书法刊物——《书苑》出版的书法资料,来梳理明治大正期间罗氏法书藏品在日本的出版情况及当时关于书法影印出版的文化热潮。

下田章平在关于日中近现代书画碑帖收藏史的研究中,将“明治维新至今的日中书画碑帖收藏史”分为五个阶段,其中“从辛亥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2期,具有跨时代性,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书画大量流入日本和欧美,也促成了这一时期以日本关西为中心的中国书画碑帖收藏热潮的形成。”<sup>2)</sup>他将第2期的“日本中国书画碑帖收藏”概括为两大集团,即“以《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和“以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sup>3)</sup>,这两大集团都与罗振玉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犬养木堂为中心的收藏集团”,规模庞大,体系完备。包括鉴赏家长尾雨山、内藤湖南等,收藏家上野理一、阿部房次郎、菊池惺堂、黑川幸七(二代)、藤井善助(四代)、小川为次郎等,以及东京的山本悌二郎,业者博文堂等等,“这种学者、收藏家、业者三者的理想合作,促

1) 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2。

2) 下田章平〈中国书画碑帖の日本流入に関する一考察—收藏家・菊池惺堂を起点として—〉,《日本中国学会報》,第71集。

3) 同上。

成了关西中国书画碑帖收藏兴盛的局面。”<sup>4)</sup>其中以罗振玉、内藤湖南、博文堂三者为中心，出版的一系列书画碑帖最具代表性，作为早期的珂罗版书画碑帖影印，不仅在书画法帖出版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记录了关西书画碑帖收藏的一些具体情况，一方面为我们研究日中近现代书画碑帖的流通和鉴藏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另一方面围绕罗振玉、内藤湖南两位学者的“鉴赏收藏哲学”<sup>5)</sup>展开了近代日中学人书画鉴藏，书画品评的研究议题。

同样作为早期珂罗版书画碑帖影印的“以《书苑》为中心的收藏集团”，于1911年创刊的《书苑》杂志，是日本最早的书法专业杂志，其中不仅刊登影印了大量的法书碑帖、印章，同时对这些资料做出了详细的解说，并刊载了许多书法研究的专业论文。且其出版的法书碑帖资料多以原寸印刷，遇到尺幅巨大无法兼顾的作品时也会按照同比例缩印，最大限度的保留其原貌，印刷精美，避免了出版后的“失真”对购读者造成的印象上的误解。《书苑》作为日本最早的书法专业杂志，具有开拓之功，以《书苑》为中心的书法研究团体，则启蒙了近代日本的书法研究。

## 二、《书苑》与黑木安雄的“书道振兴”

《书苑》由东京法学会<sup>6)</sup>出版，黑木安雄为总编辑。自1911年11月3日（明治四十四年）首刊发行，至1920年2月5日（大正九年）共出版了100册的书法资料，每卷10册共10卷，每月5日发行，收录了和汉名家真迹、旧拓等900多件，后《书苑》更名为《书画苑》在内容上做了改良，增加了画作的收录。《书苑》从创刊到停刊共持续了十年，针对每个具体的作品均有较详细的解说，除了法书碑帖的影印，另有书学研究的专业论文，涉及碑帖考证、书论、书法技法研究及书人逸事等多个方面，每刊结尾设有“书坛记事”一栏，记录书法时事。

黑木安雄（1866-1923），字武卿，别号钦堂、欣堂、著园。明治至大正时期有名的汉学家、书法家、历史学家、编辑者和教育者。为讚岐国那珂郡良野村大宫神社祠官黑木茂矩之子。黑木家族是传统的汉学家系，受家庭氛围的熏陶和父亲的影响，钦堂自幼学习汉学，十三四岁便能作诗文，在汉学塾·二松学舍学习之后，于1885年入学东京大学文学部附属古典讲习科汉书课后期课程，与其同期的同学有儿岛献吉郎、长尾雨山、山田济斋等人。毕业后，钦堂在东京府师范学校执教。先后于1890年、1902年担任香川县寻常师范学校（现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的教职和香川县工艺学校校长（现为县立高松工艺高等学校）。之后在东京担任东京帝国大学、东京美术学校（现东京艺术大学）、二松学舍等校讲师。<sup>7)</sup>其一生致力于振兴儒学和中国学术在日本的发展，书法

4) 曾布川寛〈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への誘い〉，《中国書画探訪：関西の收藏家とその名品》，第5頁。

5) 陶徳民〈内藤湖南における中国趣味の形成とその影響〉，《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库所蔵品集》，第189頁。

6) 法学会干事名单：磯野於菟介、大口鯛二、岡山高蔭、高田忠周、田中親美、黑木安雄、後藤朝太郎、油谷達、七條愷、樋口勇夫等。参见《书论》第一卷第一号，第14頁。

7) 参看梶原竹軒監修《讚岐人名辞書》，第581頁；松本龍之助《明治大正文学美術人名辞書》第308頁。

造诣也极为深厚，有“挥笔如挥剑”<sup>8)</sup>的美誉。其在书法方面的著述有〈学书的方法述论〉，与犬养毅共著的《书道及书迹：书画古董丛书第5卷》，《书道书迹大观》等。

1911年（明治44年），为振兴书法事业，黑木安雄组织成立法书会，并发行月刊杂志《书苑》。作为《书苑》杂志的领头人，“作为学者书家”<sup>9)</sup>，他不仅在每卷卷首执笔发刊辞，呼吁振兴书道，同时以论文的形式详述书法技法，成文〈学书の方法述论〉，以连载的形式刊发。《书苑》刊印的法书碑帖作品的解说，大多也出自他笔下，或解释碑帖来龙去脉，或作书法风格品评，都体现了他深厚的书法素养和学术功底，其于书法事业的“良苦用心及惨淡经营”<sup>10)</sup>，于此可见一斑。

《书苑》第一卷、第一号〈發刊の辭〉中，钦堂开明宗义，道出《书苑》“书道振兴”的发刊缘由，即“我が帝國民の書道を向上せしめんことを計りてなり。”<sup>11)</sup>接着他谈到：“古今人墨蹟の取りて以て法とすべきものあらば之を集めて轉印頒布以て研究の資料とし尚冊子の一半には書道に關する論釋叙記を掲げ、會友相互の知識を交換し見聞を擴充するの途を開けり。此れ亦書道の向上を求めんが為にするに外ならざるなり。”<sup>12)</sup>解释了《书苑》的具体内容，即书法资料的颁布和书法研究的论述，并有意识的将书法学术研究接轨于其他学术领域，以书法研究成果扩充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材料和研究门径。在对整个书道史的宏观把握下，最后总结到，“人或は謂はむ、此の如くんば舊習の法帖の書道研究と何の擇ぶ所あらむと。否、否、思ふに舊習の法帖は選擇己に精ならず、而かも摸勒全く真を失へるもの、觀あり。今や然らず。真蹟を蓄めて其の萃を抜き、印刷を精くして其の真を傳へんとするに在り。故に筆迹の先後書勢の輕重は固より旋折、往復の微に至るまで敢て毫釐を違へざるを以て、直に古人の風神に接するの道は、之を措きて復た何をか加へんや。今や初判に際し聊か鄙言を述べて、書苑発行の縁起とす。”<sup>13)</sup>表明了钦堂法书精印的意义，以及“学书需观真迹”，“毫厘不可偏差”的书法学习、研究态度。

《书苑》第四卷第二号〈改卷之辭〉中，一外国人对日本书道古今之变下泥古不化、尚意好奇及碑帖之争下文人相轻的书法发展现状提出批评，“大正书道，书之威严、品格、韵致、玄味皆丢失了，却还自我标榜为东亚美术国之精华的长鸣钟，厚颜甚矣”<sup>14)</sup>，对此钦堂坦然接受，并引以为良药，呼吁同仁，“法の真諦を大中至正に求め、術の蘊奥を積力累功の中に究めむ”<sup>15)</sup>，以“大中至正”为“法之真谛”，潜心研究“术之蕴奥”，承古拓新，如此才能免遭讥讽<sup>16)</sup>。此后，这一“书法中兴”的理念也在发刊辞中被反复强调。

8) 黑木矩雄〈三代の漢学者—黒木茂矩・安雄・典雄—〉，《斯文》第116号，第25页。

9) 同上。

10) 同上。

11) 〈發刊の辭〉，《書苑》第一卷，第一號。

12) 同上。

13) 同上。

14) 〈改卷之辭〉，《書苑》第四卷，第一號。

15) 同上。

16) 同上。

在黑木钦堂和同仁的努力下，法书会日益壮大，会员曾多达两千多人，<sup>17)</sup> 身份包括官员、商人、学者等等，遍布日本全国各地。钦堂在《书苑》第三卷，第一号〈改卷の辭〉谈到，书苑的经营没有违背初衷，会员渐渐增多，书艺勃兴的景况也逐日进展，<sup>18)</sup> 那么，在书艺勃兴的发展过程中，法书会开展了哪些工作，以黑木安雄为首的学人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又体现了《书苑》什么样的刊行理念，法书会团体于书学研究的意义如何？面对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书苑》本身，做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书苑》秉承“真迹之上，去伪存真”的原则，正如钦堂所言“前賢の真蹟を第一位に置ける”<sup>19)</sup>，对于古人法书和旧拓碑帖都慎重鉴别，尽可能去伪存真。“書苑は爰に意を用ふることに親切に、假令傳世の墨寶として推尊せらる、者たりと雖ども、慎重に子細に之を鑒別して、苟くも謬の存するものは之を排除して、讀者をして、讀者をして迷宮に彷徨する如きこと無からしめむことを庶幾せり。”<sup>20)</sup> 通过书法材料的甄别精鉴，由真迹出发，研究书法古法，笔法要诀，才能真正振兴书法。在《书苑》第五卷、第一号〈開卷の辭〉中，钦堂谈到，“我が書苑が資りて法書とすべしとする材料は、第一を古賢の真蹟とし、第二を舊榻の碑帖とせり。而して二者兼ね收め、彼此相照らし、書字の本義を窺ひ、行筆の要訣を明らかにするに便せしむるは、本誌の最も斯道に貢献する所の大事なりとす。我が法書會執る所此の如し。”<sup>21)</sup> “窥见书写之本义，揭示笔法之要诀”正是《书苑》之刊行宗旨和职责所在。

其次，法书会招聘和邀请专业的书家、学者、鉴藏家，集思广益，共同促进《书苑》内容的完善以及书法事业的振兴。对于新的材料，不仅慎重甄别，更是详细的做出注解，例如影印的青铜器铭文拓片，均有高田忠周（图1）作小楷释文付其后。“招聘专门的学士，做字学溯源阐释研究工作，”<sup>22)</sup> 亦可见日本近代书法学人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书苑》中不仅摘录了前贤书家的书论、书事，同时刊行了很多书法研究的专业论文，有考证类，如林泰輔〈毛公鼎銘考〉、中村不折〈大觀帖考〉；书史研究类，如高田竹山〈書體の沿革〉、樋口銅牛〈書風と書體と〉；书论研究类，如黑木欽堂〈張伯起の書論衍意〉，松本亦太郎〈東西の書論〉；书法技法研究类，如黑木欽堂〈魏稼孫の「書學緒聞」に依りて習字の方法を講述〉，實庵居士〈執筆法概要〉；书法鉴赏类研究类，如雨澤畔人〈書畫鑒賞の標準〉、實庵居士〈書學鑒要〉；金石学研究类，如茅原東學〈關東訪碑記〉，後藤朝太郎〈北京を背景とする書の價值〉等，还有书法周边以及篆刻的相关研究，如滑川澹如〈文房四寶〉、沈先甫〈印談〉，同时还有西学影响下书法研究的论述，如松本亦太郎〈西洋の書學〉，〈書の鑒賞の心理〉等等。

17) 《书苑》第二卷，第一號

18) 黑木安雄，〈發刊の辭〉，《書苑》第三卷，第一號。

19) 黑木安雄，〈新年之辭〉，《書苑》第四卷，第九號。

20) 黑木安雄，〈新年之辭〉，《書苑》第三卷，第七號。

21) 黑木安雄，〈開卷の辭〉，《書苑》第五卷，第一號。

22) 黑木安雄，〈新年之辭〉，《書苑》第三卷，第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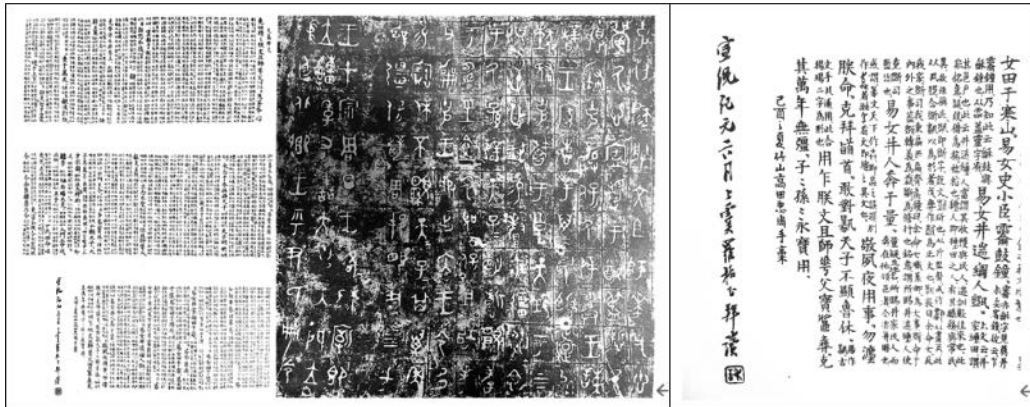


图1 周可鼎铭拓本及高田忠周小楷释文、罗振玉观记

今天的我们再回头看，可以说《书苑》几乎囊括了如今书法研究的方方面面，参与人员不仅有日本学者，也有中国学者，不仅有关东学人，也有关西学者，不仅有文学博士、工学博士，同时也有政商人士、出版家、鉴藏家。正是这些不同身份人员的协同合作，组成了“以《书苑》为中心的书法研究集团”。作为最早的书法专业杂志，对书法事业的振兴、书学研究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启蒙和奠定了近代日本书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格局。1995年，书学书道史学会五周年記念・誌上座談会中，参会的各位学者就“書学書道史研究の現状と展望”这一议题展开讨论，充分地肯定了《书苑》作为书法学术刊物的价值和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sup>23)</sup>

黑木钦堂曾反复强调书道之“道”，他谈到：“書は活物なり。道は古今を貫けり。……今書は凡俗にして安んぞ吾に及ばんやと。吁此の予至自大の徒人に取りて善を為すの道を悟らずして自己の小なるを覺らざるなり。”<sup>24)</sup>《书苑》“道を大中至正にとり”<sup>25)</sup>的理念始终如一，针砭时弊、去伪存真、钻坚研微、溯源古法，这正是黑木钦堂大中至正之道，也是《书苑》振兴书道之道。

23) 西林昭一：“話を具体的にするために出版物でみますと、まず大正時代に法書会から『書苑』というものが出され、それから三省堂の『書苑』というものが出、さらに戦前は『書道』もあり、そして戦後は『書品』がありました。それらは当時あっては、一般の書家方が知り得ない各分野の新資料の公開、提供といったものが随分あ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ね。”書学書道史学会五周年記念・誌上座談会《書学書道史研究の現状と展望》，P61-62，1995。

24) 黑木安雄，〈發刊の辭〉，《書苑》第一卷，第一號。

25) 黑木安雄，〈新年之辭〉，《書苑》第四卷，第九號。

### 三、罗振玉与《书苑》杂志

法书会会约中明确表明“对本会事业给予特殊赞助和裨益”<sup>26)</sup>的为特别会员，特别会员的名单中，罗振玉作为唯一的中国学者赫然在列。《书苑》中不仅刊印了很多罗振玉收藏的碑帖法书，同时也刊载了罗氏在日的书法活动及其法书题跋文字，现将《书论》中罗振玉相关的记载作大致梳理。

其一，《书苑》第一卷，第三号“记事”一栏有〈羅振玉氏日本に來住せむ〉一則，“金石碑板の蒐藏と古書の校勘とを以て世に知られたる清國現任農科大學長叔蘊羅振玉氏は日本に來往の志あり家族を擧げて去十四日來朝し京都に一戸を構へたる上一應北京に引還せり。”记录了罗振玉1911年举家东渡，在京都安置眷属，短暂停留后匆匆返京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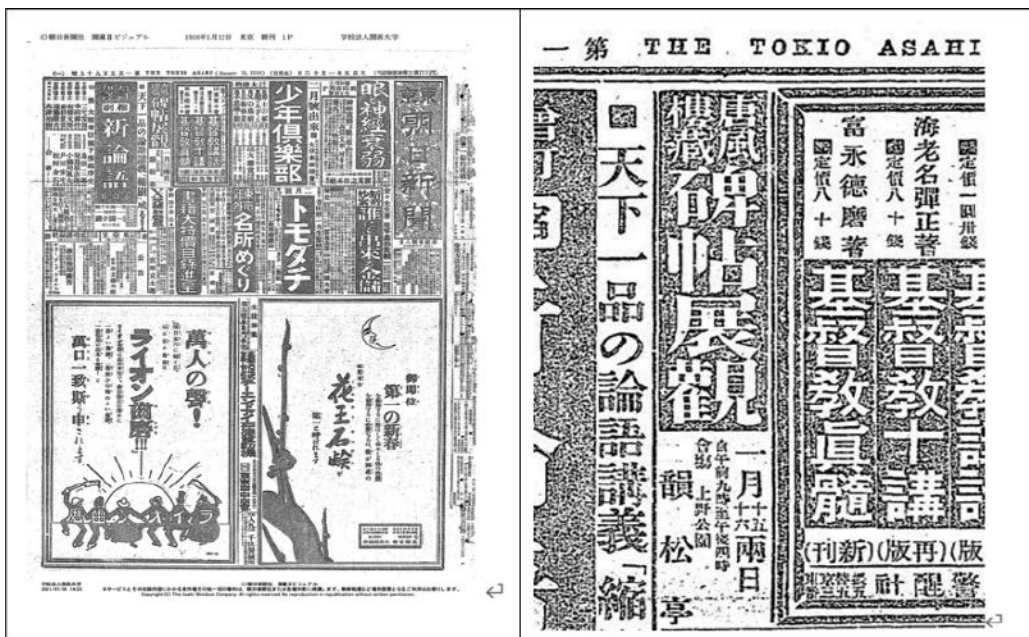


图2 1916年1月12日《东京朝日新闻》关于“唐风楼藏碑帖展覧”报道

其二，《书苑》第六卷，第二号“记事”一栏有“古碑帖展覧”一則，“清國の碩學叔言羅振玉氏國變に遭遇してより地を本邦に避け、京都の僑居に在りて専ら著作に従事し、待刻の書尠少なりとせず。爰に其所藏の舊刻精拓の碑帖の重複せるものを售りて刻書に資てむと欲し、我

26) 〈法书会会约〉，《书苑》，第一卷，第二号。

文求堂主人に囑して事を謀らむ。主人乃ち一月十五、十六の兩日上野公園内韻松亭に之が展覽會を開き、都下の同臭味者をして隨意採擇購取せしめたり。”此则记录了罗振玉避居京都期间，托文求堂主人出售所藏碑帖复本，于上野公园韵松亭举办碑帖展览一事，1916年1月11至13日，《东京朝日新闻》也曾连续三天为其作广告宣传，标题为“唐风楼藏碑帖展观”。（图2）为了筹措出版资金，罗振玉藏品曾反复在上野公园展出。<sup>27)</sup>除了上野，罗振玉藏品也曾在东京、福冈等地以展览会的形式展览出售<sup>28)</sup>，“除了规制生活、筹措出版资金”，罗振玉还将碑帖售卖的所得资金，用以“救济灾民”，一方面反应了罗振玉经世济民之志，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他对文物流通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认知。<sup>29)</sup>罗振玉一方面立足于学术，表现出为神物续命之理想，同时又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sup>30)</sup>

其三，《书苑》第六卷，第一号中刊印罗氏藏品《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十种拓本》，有黑木钦堂跋文〈书宋拓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十种后〉，跋文曰：“晋唐小楷刻帖，当以越州石氏本为冠弁。罗君叔言所藏石氏本。当为宋拓帖中佳品。规模小楷者。据若斯之帖。则庶几其不愆乎。”内藤湖南〈倪文正潇湘雨诗画轴跋〉中谈到：“明倪文正公潇湘夜雨诗画轴，旧藏备后龟山氏，岁癸丑，山本君以重价购获之。黑木钦堂实为之周旋，诸友往往讥为贗鼎，遂短钦堂。山本君因其来洛访余、为求审定。余曰真矣。后余又借以示罗叔言，叔言亦谓，文正早年所作书画，类多如此。夫鉴赏一道，诚为文墨余事，古人比之云烟过眼。然非闻见该博，秉心平正，具有另识者，亦未可与斯道。有如师心妄断，挟私是非，其伤雅道非小、可不慎诸。余既悲钦堂之屈，并以自警”<sup>31)</sup>从以上两则题跋可以看出，罗振玉与内藤湖南、黑木安雄彼此间的相互肯定。山本悌二郎的收藏，先后经由钦堂、内藤湖南、罗振玉的鉴赏的过程，亦可见关东收藏集团与关西学圈的互通。

其四，後藤朝太郎<sup>32)</sup>〈北京を背景とする書畫的價値〉一文中谈到：“北京に行く前、京都に羅振玉氏を訪ねて、現に北京に在る金石家の名を聞いて見た。”後藤朝太郎在做北京石刻研究期间，曾前往北京实地考察，动身之前专程拜访了在住京都的罗振玉，并请罗氏介绍了在北京的金石学家。从此则记述也可看出罗振玉在日本学者间的名望及与日本学人的交往。

27) 《書道全集第二五卷 日本・明治、大正》平凡社，第174頁。

28) 石田肇，〈昭和十三年の羅振玉所藏書畫展をめぐって— 没後、書畫のゆくえは〉，《書論》32号，2001年，书论研究会。此文有中文版刊登在刘恒，张本义主编《如松斯盛：首届罗振玉书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万卷出版公司，142-153頁。

29) 陶德明，〈内藤湖南における中国趣味の形成とその影响〉，《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畫— 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库所藏品集》，第189頁。

30) 包礼祥，〈罗振玉的出版思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7卷第6期。

31) 内藤湖南，〈倪文正潇湘雨詩畫軸跋〉，《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四卷，第166頁。

32) 後藤朝太郎，日本明治昭和时期著名的“支那通”，除了研究中国风俗、文字史、还著有《支那书道》、《翰墨谈》、《文房至宝》等著作。



（表 1）罗振玉书法藏品在《书苑》的出版

名称	时间	卷号	备注
《周克鼎铭拓本》原寸	1912. 1. 5	第一卷第三号	清国罗叔蕴君藏
《宋拓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十种》原寸（其一）	1916. 1. 5	第六卷第一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毛公鼎铭》原寸	1916. 3. 5	第六卷第三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宋拓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十种》（其二）	1916. 3. 5	第六卷第三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宋拓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十种》（其三）	1916. 4. 5	第六卷第四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明人姚云东真迹诗翰》原寸（其一）	1916. 5. 5	第六卷第五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善夫克鼎铭二种》原寸	1916. 5. 5	第六卷第五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桂未谷真迹国朝隶品》原寸	1916. 6. 5	第六卷第六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宋拓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其四）	1916. 6. 5	第六卷第六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颂鼎铭》原寸	1916. 7. 5	第六卷第七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宋拓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其五	1916. 7. 5	第六卷第七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宋拓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之内》破邪论序（其二）	1916. 8. 5	第六卷第八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文三桥真迹一诚徐公行状》原寸（其一）	1916. 9. 5	第六卷第九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颂鼎铭四种》原寸	1916. 9. 5	第六卷第九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宋拓越州石氏本晋唐小楷之内》墓田丙舍，阴符经，原寸	1916. 9. 5	第六卷第九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文三桥真迹一诚徐公行状》（其二）完结	1916. 10. 5	第六卷第十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颂鼎铭四种》原寸	1916. 11. 5	第七卷第一号	在京都罗振玉君藏

《书苑》以连载形式刊印了罗振玉藏品件 9 件，并有其〈高丽好太王碑释文并跋〉一文，（表 1）可作为罗振玉在日期间法书出版事业的缩影。罗振玉不仅积极投身于法书碑帖的影印出版，身体力行的集古、传古，同时又参与到日本学术圈、鉴藏圈，考古、证古。如今我们从书学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罗振玉与日本学者、鉴藏家、出版家的协力合作，对中国法书的保护、传承、鉴赏和研究，促成了近代日本中国法书鉴藏出版及书学研究的热潮。

#### 四、结语

本文从明治大正期间法书会刊行的《书苑》杂志出发，梳理罗振玉法书藏品在日本的出版流播，同时关注法书相关人员与罗振玉的交往，一方面，以黑木安雄为代表的法书会成员以“振兴书道”为己任，在刊印古代碑帖的同时，开拓出近代书学研究的门径和格局。另一方面，基于对中国法书的传承、保护，罗振玉的加入，既与钦堂“书道振兴”的志向不谋而合，又与日本近代书法鉴藏、书学研究的团体相渗透，正是这种日中学人间的“理想合作”，促成了明治大正时期书法影印出版和书学研究的文化热潮。

《书苑》虽然只是一个大文化背景的缩影，亦能窥见近代日本的书法学术的发展和转型，与同时期的中国书法发展相比，日本的近代书学研究已经起步，以《书苑》为代表的书学杂志，不仅有传统汉学式的考据文章，还出现了引用西学观念谈论书法的文章。《书苑》反映了当时日本学人注重新材料、注重真迹的书学研究方法，以及由这一团体带来的书学发展和学术转型。另外，《书苑》中刊印的有些署名日本收藏家的法书碑帖，原是罗氏藏品，后归日本藏家收藏，其中涉及到罗振玉所藏法书碑帖的流通、鉴藏的问题，有俟来日。